

全球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丛书·看世界系列 ④

ON TPP BY WORLDWIDE MAJOR THINK TANKS

国外智库看 TPP

王灵桂◎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外智库看 TPP

王灵桂◎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智库看 TPP / 王灵桂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2

(全球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丛书·看世界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8280 - 4

I. ①国… II. ①王… III. ①区域经济合作 - 国际合作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7389 号

全球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丛书·看世界系列④

国外智库看 TPP

主 编 / 王灵桂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仇 扬 安 静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4.25 字 数: 64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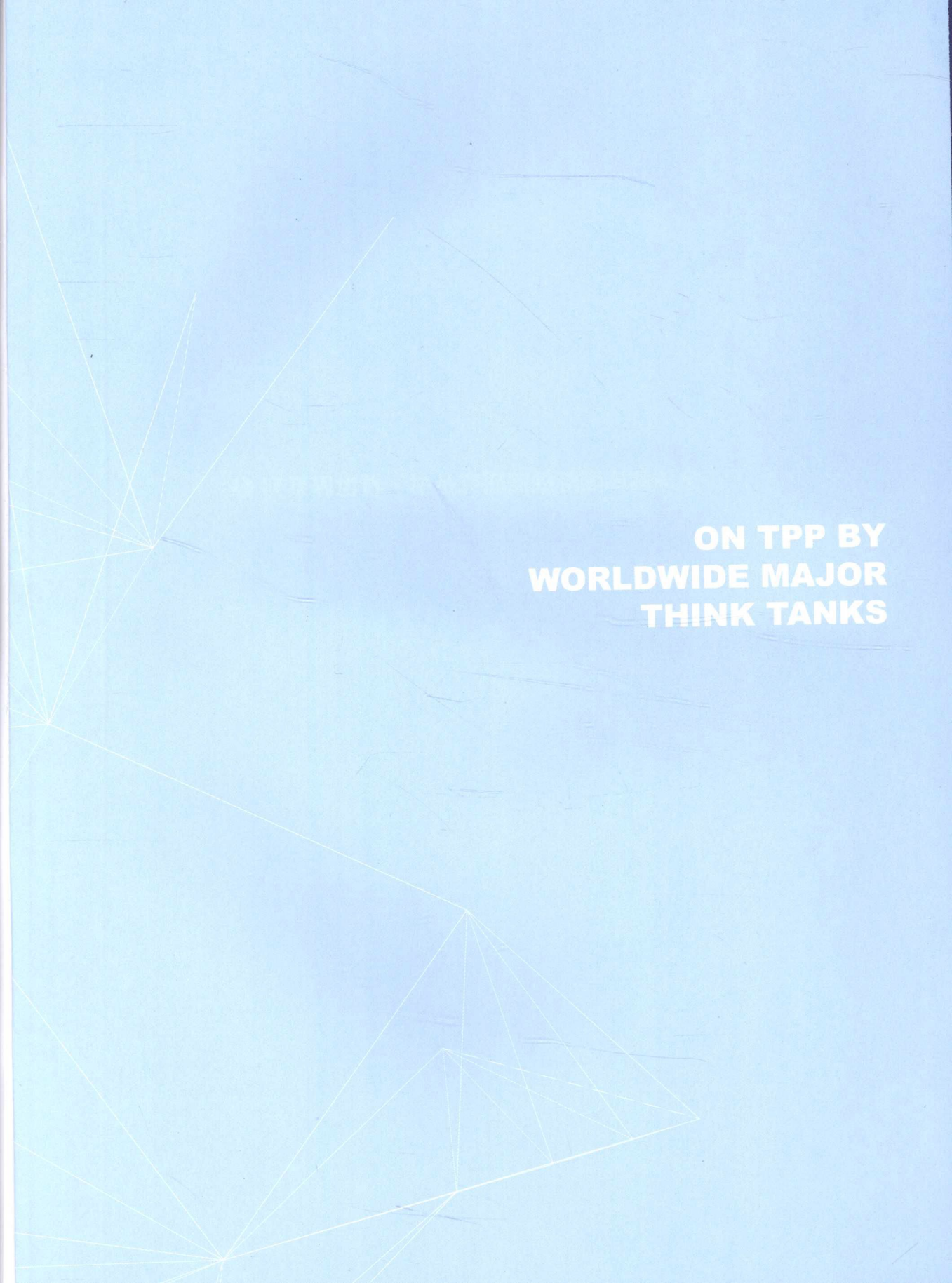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280 - 4

定 价 / 16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blue color. Overlaid on this are several thin, yellow lines that form a complex geometric pattern. These lines radiate from various points, creating a series of triangles and polygons of different sizes. Some lines are straight, while others are slightly curved, giving the design a dynamic and abstract feel. The lines are most concentrated in the lower-left and upper-left areas, with some extending towards the center and right.

**ON TPP BY
WORLDWIDE MAJOR
THINK TANKS**

全球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丛书·看世界系列 ④

全球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问：陆忠伟

主任：丁奎淞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奎淞	王健	王镭	王灵桂	王学珺	邬瑛
苏秦	李永全	李向阳	李绍先	杨力	吴白乙
陆忠伟	林林	林利民	郑秉文	赵建国	赵铁军
段小燕	施鹤安	曹中建	朝戈金	谢曙光	臧峻

工作团队（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鹏	王龙凤	史培莲	冯泽鹏	成功	刘文
刘生钰	刘思彤	刘铨臻	齐弘佳	安国君	安国强
李玲玲	邵诗洋	邵逸文	赵芯楠	洪和文	高子华
董明月	韩同飞	景峰	翟玉婷		

秘书长：景峰

策划/主编：王灵桂

总 序

TPP 对亚太贸易格局影响有多大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4 年来，通过不断改革开放而获得 WTO 红利，并在世界经济大潮涨落中经风险，涉险滩，逐步掌握驾驭、调控及应变能力，在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确立起当之无愧的“改革大国”地位。改革、开放、发展、稳定，成为中国治国理政之真谛及国家繁荣昌盛之保障。

入世 14 年，弹指挥间。国力上升托起大国万千气象，中国逐渐步入世界政治舞台中心与经济前沿，直面的国际风云不可同日而语：大壑随阶转，群山入户登，后 WTO 时代的中国经济随之面临三“T”——BIT、TPP、TTIP 的新问题。正可谓：“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2015 年 10 月上旬，以美国为首的 12 国签署了 TPP 协议。此“T”是继 1993 年美、加、墨三国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最重要、最广泛的地区性协定；它将全球 40% 的商品经济汇聚于一个大市场，以“巨体量”、“全覆盖”、“高标准”、“多边化”为特征，凸显自由贸易发展新形式、新方向，故也被称为 WTO 升级版。缘于此，此“T”又被奥巴马总统称为“历史性协议”。

TPP 12 个创始成员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规模的 40%，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力不谓不大。12 国中，尤以美日两国的经济体量为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TPP 协议的达成亦等于美日双边自贸协定顺坡过关，宽广的太平洋因之成为“免税贸易大洋”，约 1.8 万种美国商品将受益于该协议而进入该市场。

TPP 协议的签署，致使中国学术界、经济界、舆论界、战略界的眼球顿时聚焦于此“T”。关于 TPP 协议与中国经济走向的话题一时充斥媒体，热络哗然，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在对 TPP 的定性、定调上，性恶论有之，性善论亦有之。俗话说，喜怒知度量，利害见精神。立言立论，应该有缘有故；孰是孰非，必须事白情明。此乃做学问、搞研究之基本。

性恶说多从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美国战略、美日提携、中美关系等战略与安全角度加以分析，从而得出遏制论、黑哨论、孤立论、打压论、边缘论、弱华论等

观点，认为 TPP 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T”于美国而言，是其主导世界贸易规则的里程碑、“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环节。

性善说则从贸易法规、市场开放、资源禀赋、产业调整、区域融合等经济与合作视角加以研判，从而得出倒逼论、机遇论、闯关论、追赶论、接近论等观点，认为 TPP 协议将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应向 TPP 规则接近。

不能不说，两种观点均有一定合理成分。对 TPP 协议的签署，舆论界、学术界和战略界不论是突出其脆弱、短板的一面，抑或渲染其强大、敌意的另一面，进而作出武断的判断，都是不足取的。于入世 14 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而言，举足宜行中上路，入门俱是过来人。保持战略定力不动，沿循改革方向前行，乃不二法门。

有学者说，TPP 实际就是一种新型自贸协定，它较之传统的 FTA，只是实现路径不一、交易规则不同，国际贸易自由度更大。此外，TPP 是按西方会计、财务、环保、劳工及银行制度而建立，并非所有国家都能达到如此高的标准。因而，较之传统的“实力博弈”，TPP 更是凭借金融、贸易、规则等方式而展开的“合作博弈”。

美国牵头推动 TPP，确有其战略、政治、经济等方面考虑。鉴于发达国家经济仍占全球一半以上规模，所以，此“T”达成协议表明，世界经济规则制定者姓“北”而不姓“南”；美国欲借此对外表明的意思即是，没有美国的一体化是低标准，TPP 是高标准，亚太通商秩序主导权掌握在美国手里。

TPP 协议的不少规则涉及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正因此，它也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值得重视的经贸议题。中国在首轮谈判未能加入，但会争取加入。中国对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区域安排胸中有数，做好了参与博弈的各项准备。学术界、战略界应该有自信，勿先入为主，而应思其始而成其终，精心谋划、多方论证、趋利避害、建言献策。

于中国而言，亟待解答的课题不少：TPP 能否高标准运营？对亚太贸易格局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面对占全球经济体量 40% 的 TPP，中国有无捷径可走？能否实行“蛙跳”战术，绕开它与 12 个成员国一对一谈判，自行拓展双边或多边 FTA？在亚太地区推进 RCEP，能否达到殊途同归，等同于 TPP 的效果？

在 TPP 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应淡化而非强化 TPP 的政治色彩，降低中美战略抗衡的分贝，避免陷入误区导致战略误判。另一方面，应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产业与贸易结构升级换代，致力于提高商品非价格竞争力，以逐步适应国际经贸新规则，做大做强 TPP 这块压舱石，进一步稳定并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与各国的“命运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关系。

TPP 文本内容有待全面披露，其实现路径等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目前读者只能从学术界、舆论界、战略界的论战来感知大概，万花筒里看世界，无从开展系统性研究。

幸运的是灵桂同志和他的团队正在做一个“国外智库看中国”的系列研究项目，其中包括美、加、欧、俄、日、印、澳及东盟等国的一流智库对 TPP 及其与 TTIP 的关系、中国选择的看法等。才自内发，学以外成。这些来自外部的学问，厂家直销、原汁原味，知味一尝，有助于了解来龙去脉，闻香十步，能加深认识国外智库，亦能从其研究成果中了解 TPP 的前世今生和未来的可能走向。海外智库的报告和观点从其所在国、所代表的利益而来，可能谬误与精彩并存、合胃口与倒胃口同在，但拿过来，予以扬弃，可能会对学界的研究、决策者的战略战术取舍，起到“他山之石”之功效。这也是灵桂同志历来致力于追求的学术目标和家国情怀。

人不厌学，方成其圣。灵桂同志是个勤奋的学者，成果颇丰。几年来，我已为其多本专著和编著作序。好消息何时来，二月杏花、八月桂；实功夫何处下，三更灯火、五更鸡。其治学之辛苦、研究之追求、书生之家国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我不研究 TPP，但亦感此“T”事关重大，故有感而发，敲字成文，是为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

陆忠伟

序 言

义胜欲则昌 欲胜义则亡

本书是全球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丛书·看世界系列的第一部。之所以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rans -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① 作为全球战略观察的第一个切入点，目的是想从这个角度和领域，力图为“21 世纪的美国病”把把脉。

当今的美国，有“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民主政府和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已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为全球经济和金融活动提供包括机制和规则在内的诸多公共产品，不可谓不强。民主政府的各项制度极为繁复，自认为是全球学习的楷模，政府活动覆盖到内政外交、生产生活一切方面，也不可谓不强。市民社会也发展到十分健全的程度，无论是权利保障的水平、自我组织的能力还是参政议程的渠道，都非常先进”。^② 但是，“美国衰落说”以及“美国还行不行”等“美国病”的说法，却在近几年不绝于耳。

2008 年始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发生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进一步让“美国病”的说法不胫而走。仅仅用最简单的观察就能看出“美国病”的症状：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正在不断滑向金融化、空心化，华尔街的金融套利愈演愈烈，下一代的美国人要为当今沉重的社会福利埋单，政策决策越来越受制于利益集团和短期民意挟持，对外政策的民粹色彩日益浓厚，等等。“美国病”本是美国自己的事，犯不着别人操心。但是，问题在于已经和正在制定全球行

① 2015 年 10 月 5 日，十二个 TPP 谈判成员国部长级会议在美国亚特兰大就 TPP 各条款达成一致，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和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本轮 TPP 部长级会议于 9 月 30 日召开，原定于 10 月 1 日结束，但由于谈判各方对农产品市场准入、汽车原产地规则、制药业知识产权保护等三大领域分歧巨大，会议被迫延长数日。最终协议需要得到各国最高领导层及议会批准后会正式签署。对于美国而言，TPP 协议如何获得国会批准尚是一大难题，尤其在总统大选备战之际，共和党党内选票领先者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反对 TPP。在此前的授权法案中，约有 80% 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

② 王鸿刚：《“21 世纪的美国病”——美国的“现代国家治理难题”初析》，《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7 期，第 6~7 页。

事规则的美国，其“病症”也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全球的经济停滞、贫富分化、动荡风险无不与其“病症”密切相关。特别是如果美国的“病症”继续加剧，不排除其会采取更加内顾性、零和性，乃至挑起危机、制造危机、转嫁危机的政策，这将对全球稳定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构成新的威胁。而现实也佐证了这种看法，当今世界的“经济低迷、地缘动荡、恐怖危机、文明摩擦等各种乱象此起彼伏，现行国际秩序和体系面临新的挑战”^①，其原因与“美国病”在全球的蔓延和扩散密不可分，或者说美国已经在向外转嫁自己的压力和“病症”。

近一个时期以来，扎在厚厚的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书稿中，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繁的观点中，感到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子夜难眠，信翻旧书，偶捡《六韬》。读之，令人灵光顿开。原来，早在 3100 多年前，中国的先哲们，就为“美国病”开好了药方。这话听起来有些过于穿越和牵强，但仔细琢磨，在匪夷所思之中，却确实包含着治国理政的不变真理。

《六韬》之开篇《文韬》，讲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商朝末年^②，周部族的西伯侯姬昌^③到渭水北岸打猎时，在河边遇到了一位头戴斗笠的钓鱼翁。两人聊了几句，顿感投机，姬昌认定钓鱼翁是难得的贤才，遂问以军国大计。这也就是有名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两人初次相遇时，姬昌请教姜尚^④：“树敛何若而天下归之？”姜尚回答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此言一出，姬昌叹服地说：

① 国纪平：《合作共赢让世界更美好——写在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之际》，《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6 日。

② 据考证，姬昌此次出猎应是在帝辛三十一年（公元前 1123 年）。帝辛是商朝第 30 代君主，也是商朝的亡国之君。帝辛死后，谥号纣王，又称殷纣王、商纣王。

③ 姬昌，即周文王，周朝奠基者。姬昌勤于政事，广罗人才，对许多外部族以及商王朝的人才，他都以礼相待，委以重任。现在电视剧中耳熟能详的周朝干臣，如伯夷、叔齐、太颠、散宜生、辛甲等，都是姬昌收拢的，他们为周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④ 姜尚，字子牙，东吕乡东里人（今山东潍坊或日照人）。其先祖曾因掌管四岳有功，封于吕（今河南宛县），子孙因封地而改姓，因此姜尚又名吕尚。姜尚饱学兵法战策，曾去商朝都城朝歌求取功名。未果后，因家境极贫困，只能在渭水河畔以钓鱼为生。偶遇姬昌时，姜尚已经 80 岁了，但依然被收罗帐下。后姜尚被周朝尊称为“太公望”，故又被称为姜太公。

“允哉，敢不受天之诏命乎!”。^①

姬昌与姜尚的这段对话，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就是，姬昌问：“怎样才能凝聚人心而使天下归顺？”姜尚回答说：“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你若能和天下人共同享受利益，就能取得天下；如果独自垄断天下所有的利益，就将失去天下。天有四季轮回，地有丰饶物产，能和天下人共享岁时和财物的，称为‘仁’；‘仁’在，天下人自然信服。能够善待生命，解除灾难，救济急需的，称为‘德’；‘德’在，天下人自然信服。能和天下人共享欢乐，共担忧虑，休戚与共的，称为‘义’；‘义’在，天下人自然信服。天下没有不害怕死亡、不向往健康的人，（执政者）以仁德之心施政，义自然成为利，义复生利，称为‘道’；‘道’在，天下人自然信服。”听完这段论述，姬昌佩服地评价说：“太对了，我怎么敢不听从上天的旨意呢！”于是，“乃载与俱归，立为师”^②，也就是说姬昌佩服之余，便礼貌地把姜尚请上车，一同回到了在丰邑^③的西伯侯侯府，并礼聘姜尚为国师。

初次见面，姜尚用“仁、德、义、利、道”五个字阐述了治国之道，引起了姬昌的兴趣和关注。担任国师后，姜尚按照这五字治国之道，帮助姬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使姬昌的周部族快速强大繁荣起来。后来，姬昌病危时，对侍候在左右的太子姬发^④、姜尚说：“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姜尚问：“王何所问？”姬昌说：“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姜尚遂回答说：“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⑤

姜子牙国师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见到国势良好就松懈，时机到了又犹豫不决，明知不对却乐在其中。这三种情况，说明‘道’就要衰亡了。能够谦和宁静处事，恭敬谨慎待人，强大却能柔和地包容，忍让却能刚正处事。这四种情况，说明‘道’将兴旺了。所以，义理胜过私欲，国家必然昌盛；私欲胜过义理，国家必然走向灭亡。恭敬胜过懈怠，国家必定兴盛；懈怠胜过恭敬，国家必定灭亡”。

姬昌和姜尚的这两次对话，所谈虽是治藩之策，但其蕴含的道理却是永恒的，同

① 《六韬三略》，太公望等著，夏华等编译，万卷出版公司，2013，第4页。

② 《六韬三略》，太公望等著，夏华等编译，万卷出版公司，2013，第4页。

③ 位于今陕西省省会西安市西南。

④ 姬昌次子。姬昌去世后，姬发继位，灭亡商朝，建立周朝，史称周武王。

⑤ 《六韬三略》，太公望等著，夏华等编译，万卷出版公司，2013，第11页。

样适用于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2013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各国交往频繁，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矛盾分歧，维护相互关系发展大局”，“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通篇讲话中，用富有时代特色的语言，把“仁、德、义、利、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阐释得淋漓尽致，并赋予了其更加鲜明的全球意义。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② 古老政治理念如果不和现代政治发展相结合，则会像两晋学士的“虚谈废务”那样，因拘泥、僵化而变得迂腐难耐；再好的传统思想如果不认真回应时代和现实需求，则会像战国时期赵括的“纸上谈兵”那样，因缺乏理论联系实际而变为空中楼阁。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怎样遵循“仁德”要求，处理好“义利”之间的关系，进而寻找治国之“道”、发展之“道”、共赢之“道”，是时代提出的课题和呼唤。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专门强调在对周边国家外交工作中，“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他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③ 从姬昌到今天，之间相距3100多年的漫长时光。但是认真阅读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331页。

② 出自桓宽《盐铁论》。桓宽为西汉重臣，汝南（今河南上蔡）人。《盐铁论》是研究西汉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材料。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297~299页。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可以感到两者义理相通。这种植根于“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传统理念的新时代“义利观”，给中国和世界指出了一条新型的合作路线。

看一个人的过去，可以判断其基本价值观念。看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基本发展理念。作为拥有 5000 多年辉煌历史的古老而智慧的国家，中国的先贤先哲们，历来把继承传统开创未来作为自己的使命。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者们，也毫不例外。“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把学习型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学习是前提，学习好才能服务好，学习好才有可能进行创新。”^① 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提出的学习要求中，学习历史是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②

根植传统，学习历史，汲取精华，为我和时代所用。历史和传统文化决定着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但就个体来说，无论是某个人、某个集体，还是某个国家，都面临着自我斗争的修为之战。姜尚对姬昌说的“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什么是义？什么是欲？我看无怪乎就是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对单个人来讲，就是你怎么处理自身利益和别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个度应如何把握？对集体乃至国家来说，道理也是一样。克制自己的欲望，以谦和、包容的心态与外部世界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共赢共享，实为“道之所在，天下归之”的真谛，实为“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时代倡议之主旨。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曾经为人类文明做出过突出贡献，并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在 1500 年前后的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东方，而中国在这个‘东方’概念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只是在那之后，欧洲才开始逐渐崛起，并且在 18 世纪较晚的时候，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才出现”，“在这个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中国不仅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的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自始至终占到巨大比重……相应地，中国的经济总量自然也占到世界的巨大份额。根据麦迪森（2003）的估计，1820 年中国 GDP 规模达到世界总量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 403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 405 ~ 406 页。

的 32.9%”。^①

同时，在科技方面，“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②“中国的‘四大发明’即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纸的发明，被培根誉为具有改变整个世界的力量 and 影响”，但是“这种创造发明因脱离常态经济活动，而未在其诞生地被实际转化为必要的创新，因而并没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著名例子”，“却是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传播出去，在欧洲被率先应用”，其中“基督教十字军的东征通过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发生了间接的沟通，成吉思汗的西征则扩大了与西方世界的直接交流。至于中国与欧洲的更直接大规模交流，最迟于 1517 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州便开始”，“始于 2000 多年前的丝绸之路，通过陆路和海路开通了中国与西亚、中亚、阿拉伯世界乃至欧洲的商业、文化、科技、宗教和外交联系，而阿拉伯人对于记录、保存和传播欧洲文明，沟通中西方科学技术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③

在中西交往史上，与商业、科技、宗教相比，因时代条件和语言条件的限制，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要显得偏弱、偏小，其辐射力和影响力远离于西方文化的主流视野，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西方只是被局限于极少数人的研究或猎奇之中。这也就是中西文化、中西文明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根源之一。如果说，这种巨大差异在过去的交通和信息传播条件限制下，尚不足以引起人们太多关注和太大重视的话，那么科技革命浪潮汹涌的今天，这种巨大差异正在制造误解、摩擦、纠纷和所谓的“文明冲突”，乃至战争。

在各自辽阔、庞大，但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东西方的治国观、价值观按照各自的客观环境需求和生存需求，逐渐发展、丰富起来，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和系统。和中国传统观念注重的“和”“中庸”等理念不同的是，西方更加注重以非友即敌、排除异己、改造异类、选择武力为主要内容的“二元对立论”。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由此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④，是西方世界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代

① 蔡昉：《理解“李约瑟之谜”的一个经济增长视角》，《经济学动态》2015 年第 6 期，第 5~6 页。

② 蔡昉：《理解“李约瑟之谜”的一个经济增长视角》，《经济学动态》2015 年第 6 期，第 5 页。

③ 蔡昉：《理解“李约瑟之谜”的一个经济增长视角》，《经济学动态》2015 年第 6 期，第 10 页。

④ 修昔底德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成为必然选择。公元 5 世纪，雅典的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的威胁和反威胁导致了长达 30 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两国均遭毁灭。这种理论，后来在公元 19 世纪末新兴的德国和欧洲老霸主的关系上再次得到佐证，1914 年、1939 年，德国和英国的威胁和反威胁，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表性观点，成为解释、对待和处理当前国际关系的所谓“铁律”，被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奉为主臬和对外政策的不二选择。

其中，美国人始终认为，美国的全球利益必须和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一样，建立在武力对抗和征服上。在美国人的世界观中，曾两度出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被誉为“海权论”鼻祖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观点，可以说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现代美国版和典型代表。1890年，马汉出版了被美国海军奉为经典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书。在该书中，他写道：“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得的好处超过寻常的份额，我们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① 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阅读后，认为这是一本“绝妙的书”。

“海权论”形成于马汉，但早在马汉之前，这种观点和思潮在西方蛰伏已久。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这种思潮逐渐复活并活跃起来。早在马汉之前，马克思就曾尖锐地指出：“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② 在马克思的观察中，当扩张从陆地延伸到海洋时，大国“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得的好处超过寻常的份额”，冲突和战争自然成为西方“世界性侵略体制”中唯一可供选择的武器了。

“修昔底德陷阱”和马汉“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的观点，得到了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支持。例如西方著名的国际史专家保罗·肯尼迪和米尔斯海默，在总结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时，通过对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崛起过程的案例研究，认为国家成长本身必然会导致扩张、竞争、对抗、危机、冲突，最后酿成战争。在战争中，新崛起的国家将取代先前的霸权国。沿用这种思维框架和逻辑思维，米尔斯海默在观察中国的崛起问题时，自然得出了中国崛起意味着美国必然衰落的观点，并认为在此长彼亡的零和博弈过程中，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在所难免。

西方的观念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在其有限的范围内，对某些现象的解释看起来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把一种观念当作全球的观念，并要坚持推广，那就好比要求全球的花朵都是一种形状和一个颜色一样。这实际上是一种很荒诞的想法，但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物之不齐，

^① [美] 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萧伟中、梅然译，1997，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322页。

物之情也。’国与国之间的确存在相互不理解的问题，但这就是生活。既然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制度、发展水平、生活方式，那就肯定会存在一些相互不那么好理解的事情……关键是要想去理解并努力去理解。”^①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9月22日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如是说。

从西方国家以往的历史看，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改变，往往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因为受到崛起国家的挑战而丧失霸权地位。因此，主导国家千方百计限制、遏制崛起国家，甚至不惜把武力作为扼杀对方的手段。而崛起的一方，因不能忍受霸主国家的欺凌，往往也不惜以武力挑战霸主国家。在西方国家的这种逻辑中，中国今天确实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这也是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存在疑虑、不安和焦躁的原因。仔细分析会发现，“修昔底德陷阱”的表现形式就是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及其诸多变种。从根本上讲，西方炒作的“修昔底德陷阱”，就属于“不那么好理解的事情”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国家并不善于或者说并不想“努力去理解”。

首先，“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必要条件，是霸主和崛起者的实力基本接近。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虽然使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此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依然处于国家转型和实力发展的阶段，其目标就是让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其路径选择是坚持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其前提是以我为主地融入国际社会，以维护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然走在漫长、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中国尚无能力，也无意图去挑战谁。因此，西方国家用来审视、考量中国的“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

其次，当今世界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使“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历史上看，发生“修昔底德陷阱”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霸主和崛起者之间存在误解、误读、误导和误判，类似于中国的京剧《三岔口》，人们在黑暗之中相互戒备，出现冲突的可能性自然很高。当今世界是一个以全球化、信息化为支撑的“扁平世界”和“地球村”，世界资讯与情报的透明度、战略动向和政策选择的透明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很难会在黑暗之中发生混乱。在21世纪发达的信息网络时代，强国和崛起国家之间误判的可能性

^① 《习近平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强调：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9月23日。